

前

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感悟生命的真谛,强壮思想的筋骨,汲取生存的智慧,是每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本教材旨在帮助青年学生了解祖国的传统文化,使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基本特征、核心精神有所把握,并对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创新问题有所思考;同时,通过本教材的学习,青年学生可以在多元文化格局中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更加准确而深刻地认识我们的民族,认识中国文化核心,从而提高人文素质,以理性的态度和务实的精神去继承传统,创造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未来。

本教材具有以下特点。

1.本教材根据学校培养目标和办学特点选择内容,按照社会对大学生人文素养和能力的要求,以及本课程在全校通识选修课和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地位 and 作用,进行教学内容的整合,避免与其他课程在内容上有交叉重复。

2.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及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国文化教育的要求,我们对本教材的内容进行了几次讨论,与原有教材相比,本教材突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以专题为单元进行编排,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几个核心理念:天人合一、贵和尚中、自强不息、以人为本、仁爱孝悌、忠诚信实、礼义廉耻进行系统化整合并单独列章。二是各专题章节都增加了主题思想的当代意义的内容。三是专门单列一章“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意在启迪年轻人继承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本教材可以作为普通高等院校各专业学生基础课或通识选修课教材,也可以作为中文专业的主干课教材。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成书仓促等原因,本教材难免有挂一漏万、以偏概全等错漏之处,恳请专家学者和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编 者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	1
◎ 第一节 文化的概念	1
◎ 第二节 文化的分类与基本结构	4
◎ 第三节 文化的功能	6
◎ 第四节 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	11
◎ 思考与研究	12

第一章

中国文化形成的历史地理、自然和社会环境	13
◎ 第一节 中国历史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	13
◎ 第二节 中国文化植根的经济基础	20
◎ 第三节 中国文化依赖的传统社会结构	25
◎ 思考与研究	30

第二章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主线	31
◎ 第一节 上古三代：中国文化的发轫	31
◎ 第二节 夏商周：从神本走向人本	36
◎ 第三节 春秋战国“轴心时代”	37
◎ 第四节 秦汉：大一统格局及文化走向	39
◎ 第五节 三国两晋：多元文化激荡	41
◎ 第六节 隋唐：中国古代文化的鼎盛	42
◎ 第七节 宋元：理学构建与市井文化的繁荣	43
◎ 第八节 明清：传统文化总结与西学东渐	46
◎ 思考与研究	48

第三章

天人合一	49
◎ 第一节 “天人合一”思想产生的渊薮与释义	49
◎ 第二节 儒、佛、道各家天人合一的思想	51
◎ 第三节 “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精神实质	54
◎ 第四节 “天人合一”思想的当代启示质	55
◎ 思考与研究	60

第四章

贵和尚中 61

- ◎ 第一节 “贵和尚中”的含义 61
- ◎ 第二节 儒道文化和谐包容的理念 63
- ◎ 第三节 “贵和尚中”的文化精神 69
- ◎ 第四节 “贵和尚中”的当代意义 72
- ◎ 思考与研究 78

第五章

自强不息 79

- ◎ 第一节 “自强不息”释义 79
- ◎ 第二节 中国“易”学中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 81
- ◎ 第三节 儒家、道家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 83
- ◎ 第四节 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民族性格 85
- ◎ 思考与研究 87

第六章

以人为本 88

- ◎ 第一节 “以人为本”的含义 88
- ◎ 第二节 儒家哲学“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92
- ◎ 第三节 “以人为本”的发展要义 98
- ◎ 思考与研究 100

第七章

仁爱孝悌 101

- ◎ 第一节 “仁爱孝悌”的含义 101
- ◎ 第二节 孔子“仁”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103
- ◎ 第三节 儒家仁者爱人思想 107
- ◎ 第四节 “仁爱孝悌”的现实意义 111
- ◎ 思考与研究 113

第八章

忠诚信实 114

- ◎ 第一节 “忠诚信实”的含义 114
- ◎ 第二节 儒家“忠”“诚”“信”的诠释 116
- ◎ 第三节 “忠实诚信”的具体体现 121
- ◎ 第四节 “忠实诚信”的当代价值 124
- ◎ 思考与研究 125

第九章

礼义廉耻 126

- ◎ 第一节 “礼义廉耻”的含义 126
- ◎ 第二节 儒、释、道中谦和好礼思想 128



◎ 第三节 与人为善的处世哲学	131
◎ 第四节 义以至上的价值观	133
◎ 第五节 勤俭廉政的传统美德	136
◎ 思考与研究	141
第十章 中国传统文化与理想人格	142
◎ 第一节 儒家文化及其理想人格	143
◎ 第二节 道家文化及其理想人格	150
◎ 第三节 佛家文化及其理想人格	155
◎ 思考与研究	161
第十一章 中国古代文学与艺术	162
◎ 第一节 中国古代文学	162
◎ 第二节 中国古代艺术	174
◎ 思考与研究	189
第十二章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	190
◎ 第一节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述	190
◎ 第二节 重本抑末	192
◎ 第三节 传统义利观	194
◎ 第四节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转型	196
◎ 思考与研究	200
第十三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201
◎ 第一节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与文化转型	201
◎ 第二节 继承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205
◎ 思考与研究	207
参考文献	208

绪 论

内容提要

扼要阐述了“文化”概念的定义、内涵及本质，着重概述了文化的分类与基本结构，文化的功能，中国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这些都是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弄清的重要概念。

学习目标

通过学习“文化”“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掌握汉语“文化”这个词的源流、文化的定义与特点、文化的本质和功能；明确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概念、范畴及构成特点；理解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基本关系；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认识学习的重要性、意义，为后续内容的学习奠定基础。

第一节 文化的概念

一、文化的辞源学含义

一部人类史就是人的文化史。“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早有出现。《易经·贲卦》：“贲：亨，小利有攸往。《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以‘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颖达《周易正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伊川易传》：“人文，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文的本义为纹理、花纹，《说文解字》中有言：“文，错画也，象文之属皆从文。”引申为文字、文章、礼乐制度，又可引申为装饰、掩饰（文过饰非，旧读去声），进而又引申为美、善、德行。孔文子何以谓之文？《易经·系辞下》言：“物相杂，故曰文。古者包牺氏^①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文心雕龙·原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人文之元，肇自太极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辉事业，彪炳辞义……”

“文化”二字连用，较早见于汉代刘向的《说苑·指武》，该篇中有言：“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书·束皙传》中也有“文化内辑，武功外悠”之句，其表达的含义相仿，都是把“文化”与“武力”对举。显然，我国古代的“文化”具有文明教化的意思，而在我国古代尚未使用“文化”一词之前，与之接近的词语有“人文”“文明”等。文化一词从字面上看，由“文”和“化”组

^① 古者包牺氏，是指中华人文始祖伏羲。

成，兼有文明、教化两层意思。“文”是其体，“化”是其用，合而言之，就是文明教化的作用。“文”的社会功能正在于“化”。这就是“察人文以成化”之义，也是“文化”一词在我国古代的原始含义，即孔颖达所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由“文”“人文”“文明”等变而为“文化”的概念，既包括文明、人文的内容，又含有教化的意思，这就是我国（汉文化）对“文化”的传统看法，它与西方国家的文化观念有某些相同之处，但也有很大的差异。^①



图 0-1 中华人文始祖伏羲



图 0-2 刻画在岩石上的鸟兽之纹

二、文化的定义

“文化”一词在英语中为 culture，该词又源于拉丁文中的 cultus，其原义含有敬神而耕作和为生计而耕作的意义，最初用来指对土地的开垦和植物的栽培。虽然后来语义不断变化，但原初词义的影响至今犹存，仍在影响着人们对文化的看法和对“文化”一词的使用，并进而影响人们的文化行为、文化心理。culture 这个源于西方语言和思维模式的词汇朴素地道出：在原始人时期，生产方式、生存条件是文化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从西方文化观念出发，一般认为，每一个文明阶段的文化都有一个核心因素或文化要素。只有在原始民族社会里才可能产生原始文化，或是以口耳相传为显著特征的民俗文化。口传文化和原始信息的传播方式，当是原始文化的核心要素，也是最常用来描述文字时代或无文字社会的词汇。人们从爱德华·泰勒关于文化的定义中就可以看出西方的文化观念。

文化是歧义最多的概念之一。文化与人类同时产生，一起进化并发展。古今中外很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文化一词做了各不相同的诠释。据统计，世界上关于文化的定义有 300 多种，最有代表性的说法包括，文化指人类的所有创造物，文化指人类的生活方式，文化指人类的行为模式，文化指人类精神的结晶等。而世界上最早给文化做出完整定义的是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他在 1871 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第一次将文化的含义系统地表述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人种学而言，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② 这个

^① 孔颖达（574—648 年），字冲远、仲达、冲澹，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唐初十八学士之一，唐朝经学家，孔子的第 31 世孙。生于北齐后主武平五年（574 年），八岁就学，曾从刘焯问学，日诵千言，熟读经传，善于词章，隋大业初，选为“明经”，授河内郡博士，补太学助教。

^② [英]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 [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定义对学术界所产生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我国民俗学家钟敬文认为,文化就是一定时空条件下一定的人类群体的生活方式、习俗、秩序与生存样态。^①《辞海》中关于文化的解释是“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②



图 0-3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

三、文化的本质

对文化本质比较一致的看法包括以下两点。

首先,文化的核心在于揭示人与动物的区别,即“人化物”与“自然物”的区别。“文化”即“人化”,它既包括自然的“人化”,也包括人的不断“人化”。动物是没有文化的,文化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人离动物性越远,文化程度就越高。尽管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学科对文化的理解和界定存在明显的差异,但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即文化的核心是人,文化是由人所创造、为人所特有的,一切文化都是属人的,纯粹“自然”的东西不属于文化范畴。文化便是“自然的人化”,是人类创造的“人工世界”及其形式,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也是人工产品同自然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

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既是特殊的现实个体,同时又是社会的总体。无论是作为对象还是作为主体,人既是文化的结果,又是文化的起点。文化造就了人,人又创造了文化。没有人,文化既不可能存在又没有意义;没有文化,人也就不能成为人。

文化就是“自然的人化”,在马克思看来,自然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人之外的自然,即不依赖于人而存在的自然界,马克思称之为人的“无机身体”;另一部分则是人自身的自然,即人的“有机身体”。自然的人化一方面包括人类对外在自然的能动的现实的改造;另一方面也包括人自身的躯体和全部感觉(内在自然)发生属人的变化。说到底,文化就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实体而逐步满足自身需要,包括肉体和精神(观念)两种需要的过程。

从外显的文明现实来看,文化是人的社会实践的产物。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的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在于人能按照自己的需要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同时,文化还是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是文化得以产生的基础。马克思认为,

① 钟敬文. 民俗学论集 [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② 辞海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0: 1533.

人不同于动物，人的自然属性只有在社会中才成为属人的主体性。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所以，文化是人同自然界共同完成的本质的统一。

从文化内显的本性来看，文化的这种社会本质又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生活、享受、财富。文化的内在本性，形成和发展了人的各种感官和能力。人类的文化史，说到底就是人的感觉不断解放，不断人化，不断由自然人走向社会人，从而走向审美人的过程。所以，社会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人的感觉。文化的丰富性，正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逐步发展起来。人作为文化创造主体的主观条件成熟了，人的文化意识便在社会实践中产生了，它是人的本质力量在对象世界实践的肯定方式。

其次，“文化”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发展的概念。原始人类能自觉地把自然的石头磨成圆球打击野兽，这种行为就是文化；这种行为的结果，如磨圆的石头也是文化；原始人对圆的石头能投掷得更远、更准确的认识更是文化。但是如果一个现代的成年人，当他身旁放着圆的石头和一杆猎枪时，他面对已经严重威胁着人们生命的来犯野兽时，不用猎枪而用圆的石头去打击它，这种行为就不是文化，或者说是一种“倒退的文化”“落后的文化”“死的文化”。因为这种行为没有体现今天人类的本质，即今天人类对自己和自然的新的认识和创造。再举一个例子，“崇鬼敬神”在商代是一种文化，相对于原始人类蒙昧的宗教信仰，商代人表现出的企图通过自觉的对鬼神的崇敬和祭祀活动，有目的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掌握自己的命运，应该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文化；但是如果有人今天还像商代的人那样狂热地迷信鬼神，就不能说是有文化的表现。

总之，人类是不断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文化必然随之由低级向高级进化。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文化被淘汰，成为“死的文化”；有些则被保存下来，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有些则在长期的积淀、演化过程中转变为新的文化。

第二节 文化的分类与基本结构

长期以来，人们在使用“文化”这一概念时，其内涵、外延差异较大，有各种各样的分类，概括起来不外乎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两大类。

一、广义的文化

广义的文化与自然相对，泛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由此可见，广义的文化涵盖面非常广泛，所以又称作“大文化”。关于“大文化”的构成，最简单的是划分成两层，即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就是实体文化，是指人类对自然界的各种材料进行制造的、器物的、技术的、非人格化的、客观的东西，如城池、宫殿、祠庙、长城、桥梁、器皿、工具、服饰、饮食等。精神文化又称作“虚体文化”，是指人类对自然进行加工或塑造自我过程中形成的用语言或符号表现出来的、精神的、人格的、主观的东西，如文字、语言、宗教、哲学、音乐、绘画、书法、风俗、制度等。实体文化与虚体文化组成文化统一体。例如，建造宫殿，是先设计后建造的。在设计

建筑物时,表现为精神文化;当建成这一个建筑时,就表现为物质文化,同时建筑物体现了设计师的建筑思想。建筑既是工程,又是艺术。所以说,建筑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统一体。影视先是实体,后是虚体,最终成为“欺骗”人类眼睛的艺术。

关于文化的结构,有两分说、三层次说、四层次说、五层次说、六层次说等。这里主要介绍四层次说,四层次说是从文化形态学的角度来分层的。

物态文化层相当于物质文化,表现为物体形态,故称为物态文化。它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属于实体文化。例如,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建筑艺术文化均属于物态文化层。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有传统服饰表演,展示的是中国传统物态文化。物态文化以满足人类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存需要为目标,直接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制度文化层指各种社会规范,它规定人们必须遵循的制度,反映出一系列处理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准则,如家族制度、婚姻制度、官吏制度、经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伦理道德。科举制度也属于制度文化层。中国古代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均属于制度文化层。

行为文化层多指人际关系中约定俗成的礼仪、民俗、风俗,即行为模式。这是一类以民俗民风形态出现,见之于日常起居动作之中,具有鲜明、民族、地域特色的行为模式。例如,在宋代至清代的聘礼中,男方给女方送茶,用茶不能移植来寓意一女不嫁二夫。行为文化有三个特征:一是集体约定俗成,并反复履行,如我国的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西方的复活节、圣诞节、情人节;二是形式类型化、模式化,如春节要贴对联、放鞭炮、包饺子,端午节包粽子,中秋节吃月饼;三是时间上一代传一代,好的风俗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扩展开来。有些传统风俗是可以改变的,移风易俗是文明进步的表现。例如,古代妇女缠足的习惯到了近代被彻底改变了。

心态文化层指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心理活动等,这是文化的核心。心态文化大致相当于通常所说的社会意识,可以再细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是暂时的,有流动性和变化性,如要求、愿望、情绪、风尚。例如,唐代以肥为美,魏晋时期以清瘦为美,古代诗词中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还有“环肥燕瘦”。社会意识形态则多指经过社会科学家系统加工过的社会意识,并且经过物化形态。例如,书籍、绘画、书法、雕塑等固定下来,传播天下。

以上介绍的是“大文化”,即广义文化的含义及“大文化”的体系或构成。广义的文化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重要的是要掌握文化四层次说,即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但四层次说也有交叉的情况,例如,建筑既可归入物态层,可以居住,又可归入心态层,因为建筑有可供观赏的艺术的一面。

二、狭义的文化

与广义文化相对的是狭义的“文化”。狭义的文化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观念意识形态成果,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狭义文化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成果,所以又称“小文化”。关于狭义文化的涵盖面和界说,最早的权威是1871年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他在《原始文化》一书中说,“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他强调的是精神文化。在汉语体系中,笔者在前面所讲的文化之本意——以文教化,也属于“小文化”的范畴,在一般人心目中,文化泛指一般的知识尤其是语言文字知识。例如,某人有文化指有一定的知识,实际上这种界定也属于“小文化”的范畴。

我们正在学习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小文化为主要论述范畴，也就是说主要讨论涉及精神领域的文化现象，主要论述文化结构四层次中的心态文化层。

需要强调的是，狭义文化与广义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二者是对立统一的。人们在研究精神文化现象时，不能忽略物质文化的基础和决定作用。在研究有关心态文化的问题时，不能忽略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对于心态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比如，研究饮食文化，不能仅仅从心态角度分析食物如何美观，而是建立在满足食欲的基础之上观赏、品味饮食文化。总之，不能把“小文化”与“大文化”割裂开来，不能把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割裂开来。

第三节 文化的功能

文化的功能也就是文化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文化是一个多功能的体系，众多学者对文化的功能做过不同的研究、划分和描述。综合来看，文化的主要功能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文化具有满足需要的功能

文化是人类需要的供应站。波裔英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指出：“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可见，文化具有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人类需要的功能。按照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理论，健康人的需要由低到高分五个层次：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些需要的满足都离不开文化。就拿最底层次的需要即生理需要来说，随着社会的进步，也日益增加了文化的内涵，即文化人类学家所谓的“生物需要的文化转变”。以饮食为例，人类饮食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满足食欲，还把菜肴做成花鸟等艺术品供人观赏，使人获得美的享受，从而出现了饮食文化。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服饰也不仅仅满足人的保暖需求，而且还美化人的形象，表明人的身份、职业、理想、爱好和追求，从而出现了五彩缤纷的服饰文化。再以男女两性的结合为例，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婚姻远远超出生物本能的需求。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婚姻在任何人类文化中并不是单纯的两性结合或男女同居。它总是一种法律上的契约，规定着男女共同居住、经济担负、财产合作、夫妇间及双方亲属间的互助；婚姻也总是一种公开的仪式，它是一件关涉着当事男女之外的一群人的社会事件。婚姻的解除及婚姻的结束都是受着一定传统规则所支配的。”至于更高层次的需要，其文化特色就更加鲜明了。

二、文化具有记录功能

文化是人类的记忆库。文化作为一种复杂的符号系统，具有记录人类各种活动的功能。语言和文字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在文字没有出现的年代，人们就通过口头语言，将经验、知识、观念口耳授受，世代相传。例如，民谚“晚霞行千里”是民间经过长期观察得出的结论。发现这一现象的先辈，将此民谚作为经验传给下一辈，而后代代相传至今。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字几乎都是在口头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直至今日，一些没有文字的民族依然如此。文字的出现，极大地扩大了文化的记录功能。中国的甲骨文、巴比伦的楔形文字等，都保存了早期人类社会实践的记录，让人们领略了远古先民的智慧和能力。绘画、



音乐等艺术使文化的记录功能更富有创造性。半坡遗址的人面鱼纹陶画、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帛画、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曾侯乙编钟……让人们分享古代先贤的艺术才华。随着造纸术、印刷术的出现,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文化的记录功能更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地发挥着作用。史书典籍、科学著作、报纸杂志、音像媒体,越来越宏大、全面地发挥着文化的记录功能。人类正是凭借文化的记录功能,不断积累知识经验,在前人的基础上,持续开拓深广的认知领域,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新文化。

人类创造的物质文化也有记录功能。一种工具、一件兵器、一种生活用具、一个艺术装饰、一处古建筑……都可以使人们感知到彼时彼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精神世界,以及彼时彼地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沧桑。秦朝兵马俑、汉代的画像石……使人们神往秦汉王朝的风采;长城、故宫、圆明园、都江堰、大运河……令人们惊叹中华民族先民的卓越创造力。

三、文化具有认知功能

文化是打开世界奥秘之门的金钥匙。文化把人类世代积累的最优秀的社会经验集于自身,不断获得关于世界最丰富的知识,从而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创造了条件。就个人而言,一个人呱呱坠地,对世事一无所知,然后经过家庭、学校、社会,认知其生活在社会里的“应知和应会”,从而生存于世,同时也多多少少创造着文化。就整个社会而言,不管社会制度如何变化,仍然必须学习和继承过去的文化,并通过文化认知历史和社会。恩格斯在谈到法国伟大作家巴尔扎克时说:“在他的《人间喜剧》里,作者给予了我们一部法国社会卓越的现实主义的历史……在这个历史里……我所学到东西也比当时所有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全部著作合拢起来所学到东西还要多。”人们通过阅读《红楼梦》,就可以了解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红楼梦》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从某种意义上说,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对于今天的人来说,第一个用处就是其认识价值,它们是一面面历史的镜子,让人们看到人类的昨天,思考人类的今天并探索明天;第二个用处是帮助人们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丰富扩展着对自然、社会 and 自身的认识。

在漫长的岁月中形成的文化习俗、文化传统、文化氛围,潜移默化而又深远持久地影响着人们,使人们形成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这些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具有相对稳定性,为一代代的人们认识世界提供材料和工具。同时,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又是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引导人们去认知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世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的思维方式都完全相同。因为人类的出现首先是分地域的,各地人群按照自己不同的方式来创造自己的文化。文化被人们创造以后,就成了人们生活环境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环境和文化背景。所以,对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来说,其思维方式是存在差异的。例如,绘画艺术,西方人一般追求“形似”,而东方人一般追求“神似”“神韵”。西方油画中的竹子是绿色的,枝叶茂密。中国画中的竹子却是黑色或朱色的,并且粗枝大叶、寥寥几笔。西方人画的天使有翅膀,而敦煌飞天壁画中的那些美丽仙女却没有翅膀,但她们婀娜的舞姿、轻软绵长的飘带,依然能带给人飞翔的美感,并且敦煌壁画中的仙女似乎更具有艺术张力和诗意。东西方人思维方式的差异由此可见一斑。

通过文化,人们还能不断改进已有的认识工具,并创造出新的认识工具,从而使自己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从望远镜到射电望远镜,从显微镜到计算机 X 射线断层摄影机(CT 机),从算盘到电子计算机,从航天飞机到火星探测器……这些都是很好的证明。

四、文化具有传播功能

文化是人类精神家园的播种机。文化有着传递思想感情、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科学技术知识及文学艺术等文化信息的功能。文化的传播功能与文化的记录功能、认知功能紧密相连,把文明的火种撒向四面八方。文化传播与人类如影随形,不可分割。文化传播和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文化传播,任何文化都不会葆有生机和活力,最后都将消亡。可以说,文化即传播,传播即文化。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所以能够传入欧洲,现代社会中的新颖时装之所以能畅销各地,流行歌曲之所以能够传唱四方,高新技术之所以能够推广普及,靠的就是文化的传播功能。

语言和文字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言语会传播,婴儿才会牙牙学语,于是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都能够使用同一种言语,各种信息才得以交流。文字会传播,二十四史才能为人们送来中国古代社会的诸多信息。

实物也可以传播。张骞通西域,郑和下西洋,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入藏……促进了中国与邻国,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从古代的丝绸之路到今天的欧亚大陆桥;从各种交易会上琳琅满目的商品,到艺术节里异彩纷呈的节目;从各种展览会、博物馆、运动会到科学大会、学术报告等,无不在利用文化的传播功能促进文化的广泛交流。

随着科技不断进步,文化传播功能更臻完美。电话、电报、电台、电传、网络,使得天涯若比邻,四海成一家。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通过文化传播的媒体,几乎可以同时知晓。文化传播还可以跨越时空,上下几千年,纵横亿万里,各种事物都可以通过文化的传播功能去认识。1977年,美国先后发射两艘宇宙飞船,载着地球上人类的各種信息,包括莫扎特乐曲、中国的《流水》,以及许多数学符号,飞向茫茫的太空,这是一次人类利用文化传播功能向宇宙传播人类文化的尝试。

五、文化具有教化功能

文化是无形的学校。文化是人创造的,文化一旦被创造出来,又作为一定的文化环境,影响和制约着人。人就是在文化的影响、塑造中自我完善的。因此,“文化”一词又有“教化”之义,教化人、塑造人是文化的根本功能。所有其他功能都与此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由这一个功能派生出来的。

人是文化的动物。人们不难发现,每个人不仅降生于母亲的身体,而且都降生在一定的文化之中。在吸取母亲乳汁的同时,也注定要吸取文化的“乳汁”,接受文化的熏陶和洗礼,这是因为一个婴儿来到世间,还只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自然人”,必须经过一定时期的学习和教育,才能逐渐脱离动物性,成为一个社会人。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文化环境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文化环境中,父母教他学说话,教他识别器物,教他爱憎。入学后,学校教他知识,教他做人。社会上各种道德伦理、法律规章、风俗习惯、礼仪礼节,都在引导他适应社会。文化通过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方式,促使人按照社会的价值取向来思想和行动。由于文化对人的影响具有潜移默化的这一特点,所以文化的教化功能又可以称为“默化功能”。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随着人的文化环境发生变化,人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价值观念都会受教化功能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这是文化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把教化百姓当成政治的第一要务。文化的教化功能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



极的。先进的文化可以教育人，落后的文化、腐朽的文化对人的消极影响也不可低估。因而，要积极营造健康、向上的文化环境，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抵制落后文化、腐朽文化的影响。

六、文化具有凝聚功能

文化是民族的“心理水泥”。作为民族之根、民族的精神血脉，文化具有凝聚全民族的功能。文化的凝聚功能是教化功能的延伸，因为文化可以使一个社会群体中的人们，在同一个文化环境中得到教化，为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涂上基本相同的“底色”，形成稳定的民族认同，从而紧紧团结在一起，产生巨大的认同抗异力量，维系民族的生生不息。文化的凝聚功能在民族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世界史中，苏联战胜德国法西斯，中国打败日本侵略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借助文化的凝聚功能动员起千百万人民，汇成无敌于天下的抵御外敌的伟大力量。

文化的教化功能、凝聚功能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总的说来，凡是有利于社会安定团结、人民幸福安康的文化都是积极的，反之就是消极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因而要积极营造健康、向上的文化环境，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克服文化消极因素的影响。

【案例】

2005年4—7月，应胡锦涛总书记的邀请，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新党主席郁慕明先后率团访问大陆，分别称为“和平之旅”“搭桥之旅”“民族之旅”。连宋郁三人的大陆之行，不仅给两岸架起了相互了解、沟通的桥梁，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还鲜明地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凝聚功能。连宋郁三人行程显著的共同点之一，就是都安排了各种祭祀活动。连宋郁三人都到中山陵祭拜了孙中山先生；连宋二人都到自己的祖先墓前祭拜；宋楚瑜还到黄帝陵祭拜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认祖归宗。他们在祭祀的时候，都非常虔诚地祭拜、献花、献酒、献果，并诵读祭文，表现出浓厚的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和文化底蕴。从连战的“真正地做一个扬眉吐气的中华民族”，到宋楚瑜的“炎黄子孙不忘本，两岸兄弟一家亲”，再到郁慕明的“千古中华情，中华千古魂”“我带的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回到台湾去”，都使人深深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巨大凝聚力。爱国主义思想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连宋郁等自幼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他们心中都有一团“剪不断”的中华情结，一腔爱国热血，一颗赤子之心。所以他们能认同一个中国的原则，坚决反对“台独”。

七、文化具有动力功能

动力是指文化力。文化是经济发展的驱动轮。文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文化的导向赋予经济发展以价值意义，经济制度的选择、经济战略的提出、经济政策的制定，无不受到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以及决策者文化水平的制约。文化给物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以思想、理论、舆论的引导，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方式。二是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极高的组织效能。人作为文化的单元，不仅受文化熏陶，而且也依一定的原理相互感通，相互认同，从而形成社会整体。文化的这种渗透力是人的社会性的体现，它能够促进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沟通、交流与合作，保证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在一定的组织内有序开展。三是提供精神动力。通过文化建设，可以使社会各个阶层形

成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观念，形成振兴民族经济的坚定信念，化为加快经济建设的强大动力，推动人们万众一心，奋发进取，艰苦奋斗，去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四是提供智力支持。通过文化的教化功能，培养造就高素质劳动者、建设者和各种专门人才，推进科技创新，赋予经济发展以更强的竞争力。五是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日益交融。文化不仅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而且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已日益成为许多国家的支柱产业。如电视、电影、出版、音像、文艺演出、工艺美术、体育比赛，乃至广告、信息、传播、娱乐等产业，已越来越发展为庞大的产业集团，成为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是社会变革的发动机。文化是人类社会的灵魂，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是人类社会不断进化发展、实现自身本质力量的重要手段。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当一种旧制度、旧体制无法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进一步发展需要的时候，文化对新制度、新体制的建立起着重要的先导作用。蕴藏在新制度、新体制中的文化精神，一方面为批判、否定和超越旧制度、旧体制提供锐利武器，另一方面又以一种新的价值理念，给人们以理想、信念的支撑，推动革命阶级和人民群众去变革社会，促进社会制度的创新发展。文艺复兴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推动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五四运动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推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思想解放对于改革开放的推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都证明了文化的强大动力作用。

对于个体，文化又是一根无形的鞭子，一座无形的加油站。文化的教化功能赋予人理想、信念，价值目标，赋予人坚强意志和奋斗精神；赋予人学习的榜样，激发人无穷的力量；推动人不断超越自我，追求至善至美，自强不息，不断前行。

八、文化具有创造功能

文化是新发明、新创造奔流不息的长河。文化的本质在于创造。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创新是文化的本质属性。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过程就是文化变迁。文化变迁是“现存的社会秩序，包括组织、信仰、知识以及工具和消费者的目的，或多或少发生改变的过程”。

文化创新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绵延不断的重要根源。以服饰文化为例，远古时代，人们以树叶兽皮遮体御寒。到了新石器时期，人们逐渐学会了把野麻纤维用石轮或陶轮搓捻成线，织成麻布，再做成衣服。到了奴隶社会，人们的衣服已经成为等级的标志。服饰不仅有了保暖、遮羞功能，而且有了区分身份等级的功能。随后，中国古代服饰又在各民族服饰融合的基础上，先后经过多次变革，才发展为近代、现代中国服饰，而且它还在不断变化中。在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推陈出新、革故鼎新的历史。没有革故鼎新、推陈出新，就不会有文化的发展，也就没有历史和社会的发展。

继承与创新是文化传承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两者对立统一于文化传承的全过程。我国现阶段的文化创新，就是立足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实践，面对本土文化和全球文化的合理资源，推陈出新、继往开来，批判扬弃、创造转化，锻铸出新型文化形态；就是创建超越中国传统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新文化，就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既是文化的享用者，又应该成为一个文化的创造者。作为文化创造者，我们每一个人在文化创新中都负有责任。

第四节 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

一、中国文化

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国度性）。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如汉族、藏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化，电影《红河谷》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显示了藏族文化的特征。与民族性紧密联系的是文化的地域性，或者称国度性。比如，意大利的礼仪与中国不同：送客不出门，老人不用扶，吃饭随便坐。不同地域的人群形成具有区域性的特有文化，不同国度的人又形成不同国度的文化。比如，中国文化、日本文化、泰国文化等，不同的国家都有显示各自国家特色的文化。

那么，什么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根据自己的美学或哲学观点与思维模式，在认识与改造自然、社会及民族自身的过程中所创造与积累的全部文明成果，具有自身的民族与国度特色。在这个概念中，有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中国”的内涵经历了一个逐次扩展的过程。上古时期的华夏族（汉族自称）主要活动于黄河流域，自认为居天下之中央，故称中国，含中心之国之义。秦汉之后，中国由分散状态逐渐朝着集中统一的状态迈进。元代中国疆域最辽阔，元代的版图曾一度扩展到中亚地区和南俄。清代疆域包括今蒙古国全境和俄罗斯的部分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疆域最终定位，人们在论述中国文化时，在地域范围上，以现有的雄鸡形为界。

第二，中华民族是中国文化的创始主体。中华民族是现今中国境内 56 个民族的总称，“中”意思是居四方之中，“华”本义为光辉、文采、精粹，用于族名，蕴含文化发达之义。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中国各个民族都参与了建设中国文化的共同活动，都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例如，蒙古族开创了元代，满族建立了清朝，他们的饮食、服装对汉族都有很大影响。

第三，中国文化具有自身的民族与国度特色。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一是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方块字表义、表形、表声），能把写字作为艺术——书法；二是翰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古典、经学、史学、类书和丛书等）；三是惠及世界的科技工艺，如西汉透光铜镜（四大发明带动了世界文明）；四是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诗经》、诸子散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五是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先秦百家争鸣时期的哲学，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的哲学著作，起始于中国的道教、中国化的佛教）；六是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维持了当时的人伦关系）。以上六个方面，既是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与国度特色，又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

二、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不同的文化形态来表现的各种民族文明、风俗、精神的总称。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暂且

不提,从彩陶文化算起,中国文化至少已有 5000 多年的历史,形成了世界上最丰富的文化积累。我们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 5000 年前至鸦片战争(1840 年)时期的中国文化,它是世代相传的。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历史并不是终止于 1840 年,还有近代以来的这一百多年。从历史演进的角度上来看,这一百多年已是历史而不是现实,在这期间延续下来的文化,与通常意义上的传统文化有着很大区别,这就是:随着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运动的开展,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了近代。特别是“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的文化面貌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这一切毕竟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实现的。因为任何文化的发展都不是一个消灭一个、一个代替一个的关系,而是新的文化因素注入。在现代的中国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历史的积淀,仍然保留在中华民族中间,不论在何时何地,它都在制约、影响着当代的中国人,为我们继续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提供历史的依据和现实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世界文化涌入中国之后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获得独立的、确切的概念的。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的是正确地认识世界上、历史上的中国,把握好现在的中国,创造好当今和未来的中国。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某些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有所中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地有所改变,但是大体上没有中断过,总的来说变化不大,它具有民族特色。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特有的,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不同。它历史悠久,有 5000 多年的历史。它博大精深,“博大”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度和丰富多彩,“精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高深莫测。

【关键词】

文化 《易经·贲卦》《说文解字》《原始文化》自然的人化 文化的本质 文化的分类 文化的基本结构 物态文化层 制度行文化层 行为文化层 心态文化层 广义文化(“大文化”) 狭义文化(“小文化”) 精神文明 物质文明 文化的功能 满足需要 记录 认知 传播 教化 凝聚 文化力 创造 中国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 鸦片战争



思考与研究

- 1.何谓文化?为什么说文化就是“自然的人化”?
- 2.广义的文化指什么?狭义的文化包括哪些内容?文化结构四层次说包括哪四个文化体系?举例说明之。
- 3.什么是中国文化?它包括哪些基本内容?
- 4.阐述文化的结构及其功能。举例说明之。
- 5.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什么时期的文化?
- 6.为什么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怎样才能学好中国传统文化?

1

第一章

中国文化形成的历史地理、自然和社会环境

CHAPTER

内容提要

中国是文明古国，中国文化自它产生之日起，经历了五千年的历史而从未中断、衰落，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考察这样一个传统悠久的国度里的文化，必须首先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即中国传统文化赖以产生的地理环境、经济基础以及社会结构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形成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而历史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血缘宗法伦理制，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面貌及其特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学习目标

通过学习，横向理解中国文化几个方面的问题，即：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延续和多样性的影响，地理环境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基本特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特征及对中国文化的作用。

第一节 中国历史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

中国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地理生态环境，又可分为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前者包括疆域、地利、地貌、水文、气候、植被、海陆分布等，后者包括政区、民族、人口、城市、交通、农业、牧业等。两者相互作用，不可分割，并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

人总是在一定的环境中生存的，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着人们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并由此形成不同的风俗和文化传统。19世纪法国文艺批评家丹纳指出，“种族、环境、时代”是决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性质原貌的“三大因素”^①。中国文化是古代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具有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它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得天独厚的历史地理环境以及中国文化产生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外部自然环境——地理气候等因素，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文明的孕育起着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中华民族生息和发展的地理环境因素独特，正是在这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孕育了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

^① [法] 丹纳，艺术哲学 [M]，甘肃：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47。

一、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影响

1. 与历史、文化相联系的“地理环境”内涵

中国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地理环境，指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整个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即历史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一般来说，自然地理环境，如气候、地形、地貌、水文、植被、海陆分布等，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较缓慢，有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为人们所察觉。但在某些阶段和某些局部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也可能非常迅速、非常剧烈。人文地理环境，如疆域、政区、民族、人口、城市、交通、农业、牧业等方面，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自然地理因素发展变化的速度要快得多。

地理环境不是静态存在，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上的地理环境不同于现在的地理环境，因此在考察中国的传统文化时，必须将其置于当时地理环境条件之下，研究地理环境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才能了解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在人类之初的原始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原始人类的生活、生产活动，无论是穴居野处、采集狩猎，还是垦山种植、兽驮舟行，都受到特定地理环境的限制。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中国）的出现和存在，与尼罗河、印度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黄河、长江紧紧联系在一起。人类生命与水的关系，决定了这些民族必须在大河流域的特定地理环境下繁衍发展。大河流域水草丰茂，决定了这些古国农业文化出现早、发展快。这些文明古国的君主专制集权制度的出现，又或多或少地与有效组织和管理水利灌溉等农业活动的需要有关。而古希腊文明则由于半岛多山地、土壤不甚肥沃，所以相对来说航海业和商业文化就显得发达，并由此形成了奴隶主民主政体。因地制宜可以说是文化形成的一个共同规律。古埃及的历法是根据尼罗河的涨落周期而形成的；古巴比伦则因地处平原，加上这一地区空气清新而特别有利于观察天象，所以其历法是通过天文观测得来的。

中华民族栖息生养于北半球的东亚大陆，领域广大，腹地纵深，回旋之地广阔，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繁多多样，形成一种恢宏的地理环境，这是其他多数古老文明的发祥地所难以比拟的，这为中国文化大厦的构建提供了较为宽广的基础。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在古代曾是林茂草肥、自然生态环境良好的区域，华夏先民在这里狩猎、放牧，进而发展农耕，奠定了文明的根基。但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又不仅限于黄河流域。云南元谋人、北京周口店猿人化石的发现，表明长江流域、辽河流域乃至西南崇山峻岭间也都有悠久的文明史，同样是中国文化的摇篮。中华民族的祖先早在一百多万年至几十万前已栖息于东亚大陆的广大区域内。

自殷商时代起，中华先民的活动地域也日益扩展。商人最早居住在山东半岛，大约在公元前 14 世纪迁徙并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居住中心转移到黄河中游。周人则崛起于陕甘高原，又在泾渭平原得到发展，进而向东挺进，并经营洛邑（今河南洛阳），从偏处西部的部落发展为雄视中原的王族。与此同时，楚人在长江流域发展了楚文化，使中国文化的范围进一步扩展。自春秋至战国，大体形成三晋、齐、燕、秦、楚、越六大文化区，地理范围大约包括秦长城以南、黄河上下、长江南北。《尚书·禹贡》把当时的版图划分为冀、青、兖、徐、扬、荆、梁、雍、豫九州，大体反映了春秋末期的地理范围。秦汉以后，上述各个区域文化融合为汉文化，先民继续开疆拓土，实行民族交汇，形成了广土众民的帝国，又经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发展，终于奠定了今日中国约 960 万平方千米的广大领陆，为中国文化的滋生繁衍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我国幅员广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不仅具有色彩各异的民族文化,而且同一个民族也存在着风格不同的区域文化。这一个特点的形成,也与地理环境的因素密切相关。以原始社会普遍存在的崇拜形式为例,地处山地的民族多山神、岩石类崇拜,靠近江河湖海地区的各个民族则多水神类崇拜。北方民族的动物崇拜以熊、狼为多,南方民族的动物崇拜却以蛇、鸟为主。在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汉民族文化中,祖先崇拜的现象特别突出,古代口耳相传的“三皇五帝”,无不是半人半神的祖先。这种祖先崇拜的由来,也可以找到地理环境影响的因素。汉民族文化起源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土壤、气候、水利等自然条件为发达的农业文化提供了优越的物质基础,并促进了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体(家庭)的形成,以家庭为单位直接与自然界打交道,靠天吃饭万事不求人,祖宗的一套生活方式对于子孙来说已经足够适用,家族宗法观念由此得到强化,引出了对祖先的崇拜,并且直接影响到以人伦关系为主的儒家学说的形成。再从中国文化中的居住形式看,我国地处北半球,由于采暖采光的需要,这就形成了我国建筑坐北朝南的总体格局:北方地区干燥、寒冷,沙漠草原风沙较大,故以“穹庐”式结构(蒙古包)、窑洞等居住形式为多;南方气候潮湿、蛇虫较多,“干栏”式结构(竹楼)的居住形式就十分普遍。再以饮食为例,我国南北两地烹饪理论十分近似,但饮食习惯却迥然有别,主食南米北面,菜系北方以牛、羊、猪肉为主,南方却以蛇鱼为突出,这些都是由于地理条件造成的。即使思想观念的形成,也往往与地理环境有关。我国地处北半球,太阳光自南向北斜照山川河流,人们经过长期观察总结,遂产生了“阴阳”说,成为认识和解释自然现象的一种思想武器,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并影响到各个方面。

总之,尽管人们不赞成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但必须充分认识到地理环境对文化形成的重要影响。

2. 地理环境发生影响的范围和程度

远古时期,地理环境对人类各个方面的活动,几乎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人类普遍使用石头、青铜器、铁器,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的文明和进步。这是人类能动地利用环境的开始。

到了近代、现代,人类对地理环境的利用有了长足的发展,人类对地理环境的利用能力和程度越来越大,“人化自然”的能力加强了。因而地理环境对人类具体的决定作用越来越弱。例如,遇到天旱,人类可以进行人工降雨,北方缺水,可以南水北调;地球拥挤,人类可以探讨到月球、南极居住,甚至建立海上城市。当然,人类对地理环境的利用和开发是以不违背地理环境的内在规律为条件的。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要对我们进行报复。”^① 审视当前,恩格斯的真知灼见已经成为事实。由于高度工业化和人类对地理环境的过度开发和破坏,一系列全球性的环境威胁日益严重。根据联合国公布的信息,当今世界面临的“十大环境问题”为:世界气候变暖,森林面积日益缩小,物种的灭绝速度在加快,水资源不足,大气污染严重,土地面积减少,垃圾废物成灾,资源减少,农用药害严重,人口膨胀。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不适当的人化自然产生的恶果。长江中下游频发水灾,主要是由于气候环境变化所致,人类过度采伐森林使植被遭到破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①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二、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形成和延续的影响

1. 中国早期文明发端于黄河流域，与地理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

正如古埃及文明起源于尼罗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发端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古印度文明形成于印度河-恒河流域一样，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长江流域。在中国，就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比较而论，黄河流域在文明的起源方面处于相对领先的地位，这是中国历史与文化发展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就今天来看，长江流域无论在地理环境方面还是自然资源方面，都比黄河流域优越得多、丰富得多，但是为什么中国的文明却起源于黄河流域？

如果追溯环境变迁的历史，探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昨天”，人们会发现，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适合人类文明发展的自然条件，黄河流域都要比长江流域优越，或者更准确地说，都要比长江流域更适合、更有利于人类文化的发展和文明的出现。

首先，黄河流域具有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大约从距今 1 万年前开始，地球气候明显转暖，距今 8000~3000 年前，气候温暖湿润，是最近 1 万年间气候最好的时期，国外通常称其为“气候最适宜时期”。黄河流域的远古文化发达地带，基本上完全处于亚热带气候的控制之下。

考古发掘、历史文献记载、孢粉分析的结果，都证明当时的华北平原气候比现代温暖湿润得多。尤其是根据孢粉分析结果推断的远古时代的植被状况来看，京、津及华北平原当时生长着茂密的亚热带阔叶林和水蕨科植物。而目前水蕨科在河北省境内早已绝迹，只能生长于现在地处亚热带的淮河流域。在河北省阳原县，曾挖掘出夏商时代的象化石及河蚌化石，其中的厚壳带蚌、巴氏丽蚌等水生动物的现生种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以南的地区。当时，犀牛等喜热的动物成群结队地游弋于华北平原上。

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喜热的动植物更是屡见不鲜。在属于仰韶文化时代的西安半坡遗址中，发现有先民猎获的水獭、竹鼠等动物骨骼的遗骸，其中的水獭和竹鼠在西安地区目前早已不复存在，它们的现生种仅活动于长江流域的沼泽地带。在安阳殷墟，除发现大量的水獭和竹鼠之外，还有水牛和野猪等现生于热带和亚热带的动物遗骨。在发掘出的武丁时代（前 1250—前 1192 年）的一枚甲骨上的刻文说，打猎时获得一象，表明安阳一带在商代有象在活动。河南省原称豫州，“豫”字为一个人牵着大象的标志，说明在文字初创时代，河南一带野象的活动已经成为这一个地区特有的现象，以至于造字者以“豫”来表征中原地区的特征。

其次，黄河流域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气候也是一种自然资源。气候条件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他与气候相关的自然资源（生物资源、水资源等）的优劣与丰歉。现代黄河流域的地理环境与远古时期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除了气候变迁之外，远古时期河流、湖泊及山川形势等都与今日不同。其中变化最大者在黄河下游地区，尤其是黄河的泛滥、改道，对下游地理环境的变迁影响甚大。

黄河在数千年间不断泛滥、改道，所带大量泥沙不断淤积于大平原之上，致使黄水所到之处，城池淹没，湖泊淤平。在今天的黄河下游地区，除后期形成的山东运河两岸的一些湖泊之外，几乎全部的古代湖泊均已荡然无存，难觅踪影。应当指出，远古时代黄河流域的湖泊除集中分布于今河南、山东、河北三省接壤地区之外，在黄河中游地区同样分布着许多湖泊。例如，在今山西中部的昭余、今陕西中部的焦获和弦蒲、今山西的潞泽等，

在远古时代都有湖泽，如今早已干涸，而空余地名于商代文献之中。

由此看来，黄河流域在远古时期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包括温暖湿润的气候、纵横交错的河流、星罗棋布的湖泊及松软肥沃的土壤等，使其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文明的摇篮。这也说明了地理环境在人类文化与文明发展的初期，具有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

2. 地理环境影响着中原王朝的有效统治范围

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尽管十分辽阔，但是中原王朝的有效统治范围却始终没有随着国力的强盛而扩张，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条件决定的。

农业在中国的发展有极为悠久的历史 and 相当辽阔的地域，由于地理环境原因，黄河中下游最早形成了大片的农业区。春秋战国时期，当地还有不少残余的牧业或半农半牧的民族，但到秦汉以后，除了少数民族大规模迁徙或战争动乱时期之外，牧业在中原王朝经济中已毫无地位。从秦朝开始直到清朝初年，历代最稳定的行政控制区域，基本上都是阴山山脉和辽河中游以南，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以东的中国内地。这一范围四周并没有什么难以逾越的屏障，尽管王朝的军队一次次外出远征并取得胜利，如汉、唐、元等朝代，但很少将自己的行政区扩展出去，根本的原因就是要考虑地理环境是否适于农业生产。

一般而言，一个中原王朝建立以后，它的主要统治区域往往成为“中国”，而它所统治的边缘及统治范围之外就是夷、狄、蛮。对于这些边远的民族地区，中原王朝控制力较弱，汉文化亦往往不承认其为中原之地。例如，今天的福建，从公元前3世纪末就是秦朝的疆域，设有闽中郡，但当地居民以越人为主，汉人迟迟没有迁入，所以直到东汉末年，这里明明是汉朝会稽的属地，属于中原王朝已有数百年，但东汉的大学者许靖从今浙江坐船由海路到达今越南北方时却说，一路走来“不见汉地”，即福建在当时人眼中还称不上“中国”。

3. 相对自足、资源丰富的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延续性的影响

大约从公元前3500到公元500年，世界各地先后出现了尼罗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国的黄河流域文明，以及地中海东部的爱琴文明、迈锡尼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然而，除了中国文明之外，几乎所有这些古老的文明都在其文化发展史上出现过中断现象。

古老的中国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虽历受磨难，饱经风霜，然而其文化传统却一以贯之，未曾中断，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而中国文化的这种延续性是由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的。中国地理环境具有特殊的“保护性反应机制”，不仅指其对外部文化侵入时的单纯防御性保护作用，而且指其当外部文化一旦侵入之后对异族文化的同化或融合能力，以及对于有可能导致本民族文化毁灭的环境变迁的适应能力。这种“保护性反应机制”不仅起到了单纯防御性保护作用，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各个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因而不自觉地阻碍了自身文化发展的进程。

首先，地理环境的偏远、封闭保证了中国政治-文化史的延续性。某种文明在世界文明带中的相对位置及其本身所处的地理环境的封闭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文明与其他文明相互交往关系的密切程度，当然这种相互交往既意味着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汇，更包含此一文明对另一文明之侵扰、摧残乃至毁灭。自夏、商、周至汉唐明清，中国的政治统治始终未变。即使在中国社会暂时分裂动荡的时期，中国的政治统治仍然占主导地位。

政治史的连续性是文化史连续性的保证。正因为中国文明自诞生之日起，就未曾发生过政治史上的断裂，所以保证了中国文化史的延续不绝。显而易见，政治-文化史的连续性

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中国地理环境特征所提供的“保护性反应机制”的保证作用。在世界近代史上，当西方列强的战舰从大西洋出发，穿过印度洋，向太平洋进攻的时候，由于印度的地理位置比中国偏西，所以在 19 世纪上半叶已经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而中国在 19 世纪中叶才开始受到英国殖民者的冲击。

其次，优越的地理环境使中国文化成为各个民族文化融合的“熔炉”。如果说中国地理位置的偏远而使得中国文明始终未受到其他古代文明冲击，那么，与中国文明核心区域紧相毗邻的北方游牧民族却从秦汉时代以来，就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而且无论是冲击的力量、冲击的规模还是冲击的范围，都一次比一次来得更大、更广。如果说秦汉时代的游牧民族只限于骚扰边境，从南北朝到两宋则发展到游牧民族占据中原并形成南北对峙局面的话，那么，元、清两代已经是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并建立统治全国的中央政权了。由此可见，游牧民族对中国持续的农业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然而中国文化不仅没有被摧毁，反而在这种民族文化的激烈碰撞中成为文化融合的大熔炉，并且在不断吸收游牧文化精华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壮大，从而先后将各个民族文化融汇在一起，铸成了气势磅礴的中华民族文化。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由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差异所导致的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中国的黄河流域在距今 4000 年前后已经在优越的地理环境中创造了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古典文明，而这时的北方沙漠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还没有摆脱野蛮时代。秦汉时代，中国的文化已经开始登上世界封建文化的高峰，而游牧民族才刚刚迈入阶级社会的门槛。他们充其量只能骚扰一下这个强大文明的边境，而不可能对中国文明构成冲击。从南北朝到两宋，虽然游牧民族曾周期性地占据中原并领有半壁河山，但此时的中国文化已经发展到鼎盛时期，游牧民族不但无力冲击或改变这个文化的悠久传统，而且还根据他们的经验，不得不部分地甚至像北魏孝文帝那样全部地借用汉文化来加强和巩固对汉人的统治。到元、清两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游牧民族上层分子尽管一开始也曾反对和抛弃过中国的文化，但是很快地，他们不仅自己被中国文化征服了，甚至自觉、主动地依靠中国文化来统治整个中华民族。清朝统治者就是极力利用、维护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正是无比优越的地理环境铸造了无与伦比的中国文化，使得优越的地理环境成为各个民族文化融合的大熔炉。

再次，辽阔腹地使得中国文化足以应付环境变迁的挑战。除了人类历史与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影响之外，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的变迁，也是影响文明兴衰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受惠于距今 5000~4000 年全球的气候适宜期的到来，世界上所有的古典文明才在北半球的中低纬度带上先后诞生；也正是由于距今 3000 年以来的全球性的气候向干凉方向转变，北半球文明带的大多数文明才被随之卷土重来的副热带沙漠所吞噬。只有中国文明因青藏高原的阻挡、季风气候的惠泽和具有辽阔的腹地以供周旋等有利因素的组合，才幸免于难。

中国文明是幸运的。当然，它也有磨难。尽管中国文明由于青藏高原的保护和季风气候的恩赐而免于沙漠化的厄运，但最近 2000 多年来，随着全球性气候的巨大变化，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气候上的冷干与暖湿的波动性变化。与此同时，气候的波动性变化也诱发了中国社会繁荣与萧条、稳定与动乱的周期性震荡。

自魏晋南北朝至两宋，当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中原并占据北方半壁河山的时候，中国南方常常出现所谓的“偏安王朝”。它在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开发江南方面是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的。正是中国的腹地辽阔，才使得中国文化有充分发展的余地。

三、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多样性的影响

1. 地理环境与中国文化的多样性

中国国土辽阔，面积广大，所以在中国内部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域，它们表现出不同的地理特征和丰富多彩的自然资源。各区域间的差异非常大，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主要农业区与周围地区之间，也表现在主要农业区内部。马克思曾经说：“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在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性。”这句话对于认识中国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对中国文化的多样性的作用是非常有益的。

多种多样的生产方式，使中国文化在社会制度层面表现出多样性。除了农业以外，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存在着牧业、狩猎、养殖、捕捞、采集、冶炼、手工业、林业等各种产业，形成了各地不同的物质基础。与此相适应，各地也形成了各不相同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行政制度。辽阔的疆域面积，使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和不同物质条件下的人们，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使中国文化呈现出强烈的地域色彩。在衣食住行方面，由于各地具有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物质条件，历来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例如，河北一带的燕赵文化、山东一带的齐鲁文化、湖北一带的楚文化和陕西一带的秦文化等。

在边疆地区，这些生存于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中国人，有着不同的民族、宗教、语言、风俗习惯。这表明不同的民族和不同地域的人有着不同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这同样使中国文化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2. 地理环境对开放与封闭的影响

地理环境对开放、国与国的交流确实有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迈着比内地更强有力的步伐得到了飞速发展便是例证。深圳、上海的开发，就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环境。那么，中国的地理环境究竟是有利于开放还是有利于封闭？这应该结合地理环境做具体的分析。

首先，地理环境的开放与封闭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的开放或封闭。中国的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固然有高原、平原和戈壁沙漠，但东南地区却有一万多千米的海岸线，可以通向世界各地。即使在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也存在着多处与外界交往的通道，丝绸之路就是最好的证明。

其次，在不同的生产力条件下，地理障碍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但即使生产力提高了，地理障碍依然是一个地区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的交通确实比华北平原困难得多。

最后，自然地理环境并非决定开放与否的唯一标准条件。海洋也不是开放的唯一途径。西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东汉班超重开丝绸之路。唐代玄奘不远万里到佛国印度取经。这些人所行路线都是从长安取道西行，穿越大漠而直达国外的，同样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当然也有沿海而行的人。比如，唐代鉴真四次东渡日本，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明朝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也是沿海而行的。因此，海洋并非开放的唯一途径，地理环境并非决定开放与否的唯一条件。



【案例】

中国特定的气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案例一：节气文化与气候

我国古代以农立国，节气文化是适应农业需要而很早就发展起来的。“春争日，夏争时”，农民们世代代就像打仗一样按二十四节气种地。否则，“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连收成都成了问题。二十四节气不仅指导了我国古代农业，而且深深融入我国民族风俗习惯和文化之中，有的节气还成了民间重要节日。

案例二：中医文化与气候

中医学把外感病邪分为“风寒湿热燥火”。俗称“六淫”，大部分与气候有关。南京中医学院老教授干祖望说：“欲知《黄帝内经》之精华，一半在气候。”没有中国特殊气候，也就不会诞生中医学。中医治病的主要方法之一是针灸，针灸的取穴和针探深度也都和四季有关。不同的季节应取不同的穴位，针探色深度也不一致。中药的使用也分季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专门有一篇“四时用药例”，说明用药也要讲究季节。《黄帝内经》中指出：在各季节中要分别加温热甘酸和苦寒之药，以顺四时气候而养天和之气。

案例三：诗词与气候

我国是四季鲜明的国家，这也影响到诗人的日常生活、创作环境和灵感。于是，古诗中有大量的咏怀四季的诗句，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二月春风似剪刀。”这些都是咏春的。在四季中诗人们对气候体会最深的要数夏季的炎热。杜甫遇到酷热天气就会“束带发狂欲大叫”，恨不得“安得赤脚踏层冰”。王维在《苦热》一诗中，热得想到大气层之外去凉快凉快：“思出宇宙外，矿然在寥廓。”还有展示暮秋景物的：“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这出自王实甫的《西厢记》。总之，正是四季分明的气候造成了咏怀四季的美妙诗句。

第二节 中国文化植根的经济基础

一、农耕自然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

1. 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及其重心南移

早在四五千年以前，兴起于黄河流域的新时期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就已经展现了华夏民族的祖先从渔猎经济向农耕经济过渡的历史状况。黄河流域细腻而疏松的黄土层较适宜于远古木石铜器农具的耕作，所以农业生产首先在黄河中下游达到较高的水平，使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中国上古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夏人的祖先禹，以治理水患而闻名于世；周人的祖先后稷，传说是尧时期的“农官”。这些传说都说明了农耕文明与部族的成长兴衰紧紧相连。在夏、商、西周时期，农耕文明已经成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主要文明形式，并奠定了古代中国立国的经济基础。

古代中国的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最开始在黄河流域，但是随着战乱及滥垦滥伐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逐渐南移。

唐中期以前,中国的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魏晋以后随着大批中原人口的南迁,江南得到开发。从先秦到两汉,经济和文化的重心都在北方中原地区。以人口为例,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人口5767.2万,南方只有1098.2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9%。《史记》在描述南方时曾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火水耨”。在农业社会,人口数量是农业文化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整个秦汉时期,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经济、文化较为落后。

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普及,中国的农耕区逐渐有了向土壤肥沃的长江流域扩展的能力。秦汉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更为中国农耕区向南部转移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魏晋南北朝,北方边患丛生,战乱频繁,使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迅速恶化,中原地区的人们为了逃避战火,纷纷南下,寻找新的安身之地。公元291年开始的“八王之乱”使黄河流域饱受战祸,此后匈奴、鲜卑等民族起兵反晋,入主中原,晋室南迁,大量北方居民不断渡江南来。南迁的北方移民高潮共有6次。据统计,公元313—450年,南迁人口高达90万,占南朝官方统计人数的1/6。北方移民南迁,给南方带去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和文化观念,而南方优良的自然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很快就显示出发展农耕经济的潜力。

唐代“安史之乱”之后,北方为藩镇所控制,赋税不入中央,江淮地区逐渐成为重要的经济区。隋唐以后,长江中下游区域迅速成为京都及边防粮食、布帛的主要供应地,中国农耕区的中心逐渐从黄河流域向长江中下游和江南地区转移。有谚语曾云,“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这都证明了唐宋以后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事实。“东南财赋”与“西北兵甲”共同构成了唐代以后历代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格局。正当唐代经济发展到鼎盛之际,一场“安史之乱”,8年空前浩劫,致使中原板荡、人民离散。例如,受影响最严重的河南一带“人烟断绝,千里萧条”。不少州县沦为废墟,锋镝余生之民甚至“以纸为衣”。平定“安史之乱”之后,中央政权受到极大削弱,河西陇右之地为强敌吐蕃乘虚占有,首都长安也被吐蕃兵烧掠。与此同时,藩镇势力又日渐强大。唐代的财赋收入此后主要来自江淮地区。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正式超过北方,经济重心已经移向东南地区。

宋代以后,南方已经取代北方成为经济中心。北宋初期,中央政权依靠中原的物质力量,建立了统一王朝,并因政治中心仍然建在中原地区,社会繁荣得到继续,但与南方相比,其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居于下游。北宋时,江南已经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宋初政府每年从各地漕运粮食总计552万石,其中400万石来自江淮地区,占粮食总数的72.5%,而来自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粮食仅152万石,占粮食总数的27.5%。《宋史·范镇传》有“国家根本,仰于东南”之说。“靖康之乱”之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三次人口南迁的浪潮。在此之前,南方经济水平已在北方之上,经过此次移民,南方经济发展更是远远超过北方。

2. 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对垒与融合

世界文明的演变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着自己的特点。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中国北部和西北部以游牧经济为主,而其他地区则以农耕经济为主。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体魄健壮、勇猛善战,靠放牧为生,加之地理环境的恶劣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于是他们经常南下掠夺。东汉、魏晋时期,北方地区和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不断内迁。内迁的少数民族有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历史上称他们为“五胡”。此时,少数民族迁移到中原地区定居的达几百万人。但是无论他们如何强悍,在进入中原之后他们都毫无例外地接受了汉族的先进文化,成为农耕民族的成员,共同参与了华夏文明的发展和壮大。

如果仅仅看到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侵扰中原地区显然是片面的。还应当看到，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战争与争锋，客观上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互补和民族的融合，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争锋从根本上讲是不同于外族侵略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对垒，往往以迁徙、聚合、和亲为结局。比如，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和汉唐时期开辟通西域的“丝绸之路”，可以说是中原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精妙结晶；再比如，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通婚，促进了西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再比如，17世纪以来满族建立了疆域空前辽阔的大清帝国。这期间满族八旗驻防全国各地，满族人的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也影响到全国。今天，旗袍已经成为典型的东方妇女服饰，具有世界影响力。

此外，中国的饮食文化、茶文化、酒文化乃至政治制度、生产方式等无一例外都是民族融合的产物。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历经数千年的相互融合，互为补充，汇成恢宏的中国文化。

3. 农耕自然经济下的多元经济成分

中国农耕文明以农耕经济为主体，但并非只有农耕经济一种成分，而是农耕经济和多元化经济成分并存。但中国的商业、手工业在西汉前期的发展受限，例如汉武帝的盐铁官营等官方垄断重要商品的制度，使得商业被完全束缚在封建政府的肌体之上，因而形成了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商业运作模式。中国古代的经济状况有以下特点：自然经济占主体，小农经济力量突出；西汉以前商品经济发达，但汉武帝实行主要的商品国家垄断之后，商品经济失去了它的个性，难以起到解体自然经济的作用；国家对土地等主要经济成分控制能力很强；伴随着政治的治乱，经济显示出突出的周期性破坏与复苏的循环；自然经济始终占据统治地位。

从小范围看，中国的家庭性农耕经济从产生那一天起，就不是纯粹的农业经济，而是包含着简单的家庭畜牧业、家庭手工业和家庭商业在内的一种多元经济。“男耕女织”“农忙务农、农闲经商”是中国农业社会的普遍现象。由于各个农业家庭的生产重点各有侧重，所以中国的农耕家庭经济很早就与简单的市场交换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从较大的范围看，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农业物产也不尽相同，这就势必造成农产品在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易，加之还要同西北、北方的游牧民族之间的不同产品交易，这也造成了中国农耕经济的多元结构。

图 1-1 为汉画像石农耕图拓片，汉代精耕细作的农业居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4. 内敛的海洋贸易

中国海洋事业的开拓，是促进欧洲文明特别是近代文明高度发展的有力杠杆，但是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中华文明是一种主张和平自守的内向型文化，缺乏开拓海洋事业的进取精神。因此，虽然中华民族早就有了出色的航海能力，但并没有形成一种拓展海外市场并进行殖民的机制，而是满足于这种内敛性的贸易架构，但它主要是作为农耕经济的补充而存在的。

中国的海洋贸易反映了朝贡贸易体制下的一种自足自大的心态。稳定的农业经济和较少变化的经济结构，使中国古代的帝王们陶醉于万物皆备的理念之中。因此，在他们看来，中国与海外的经济交往，应以“宾服贡献”为宗旨，经济交往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经济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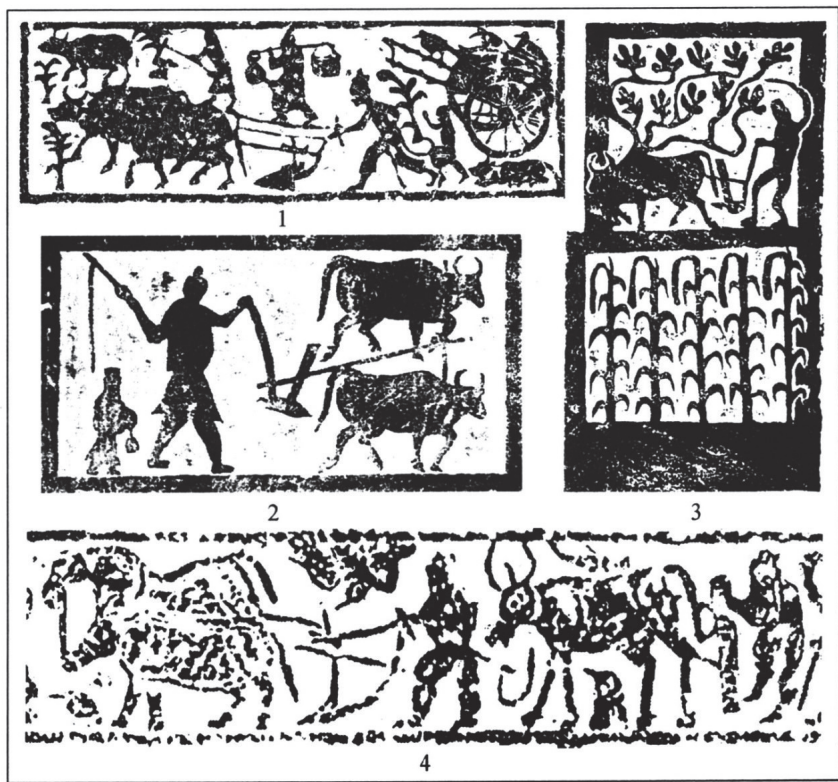


图 1-1 汉画像石农耕图拓片

中国古代也有为数不多的海洋贸易，但在海外经济往来中，主要是一种“赐”“贡”的贸易形式，属于内敛型的海洋贸易。比如，明朝郑和七下西洋，船队满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中国特产，到外国后，都是把这些特产“赐”给当地的国王，同时接受该国的所谓“贡品”，如象牙、香料、珊瑚、珠宝等特产，并不计较经济得失，属于一种“货换货，两头乐”的友好交往，其政治上互相往来的意义远比经济上的意义重大。

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的原因

1. 社会既早熟又不成熟

中国农耕社会的多元化结构造成中国社会经济社会既早熟而又不成熟的特征，制约了资本主义萌芽的顺利发展。说它早熟是指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土地就可以自由买卖了，中国的商品货币经济也在汉唐时期就达到了相当繁荣的程度，作为经济剥削的地租形态，如劳役、实物和货币地租一直长期并存，以上各种现象都比西欧国家要早得多，所以说具有早熟的特点。

所谓不成熟是指中国农耕经济受多元化经济结构的影响，始终未能促成它的成熟发展，相反却凝固了传统农耕经济的保守性和坚固性。中国社会那些早熟的商品经济因素，并不是作为封建经济的对立面而是作为一种经济补充形态出现的，这就使得商品经济这种较活跃的经济因素，往往在成长到一定程度后被农耕经济的多元化结构所化解或吸收。中国封建社会里官僚、地主与富商大贾的三位一体和相互转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表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不是纯粹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直没有走上成熟的道路。

2. 稳定与战乱、人口增长与生产发展的周期性失调

建立在个体家庭经济上的中国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是一种没有民主而缺乏自我更新能力的政体。所以，中国王朝的盛衰交替、稳定与战乱互易基本上成了一个周而复始的规律。中国的农耕经济随着王权的更替而出现周而复始的兴衰也成了一条规律。依附于农耕封建经济肌体的商品经济自然也随之出现相应的高潮和低谷现象。这种恶性的周期性循环严重地制约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使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处于迟缓的状态。

3. 上层建筑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钳制和束缚

经济剥削是上层建筑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意识形态的保守性，使得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难以成长。自古以来，历代官僚知识分子信奉的是“重农轻商”，历代王朝包括明、清两代，一直认为只有农业才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根本，而商业活动不能直接生产人所必需的衣食住行生活资料，所以从来没有得到过国家的扶持和鼓励。

此外，封建专制的政治布局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增长。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布局也不利于商品经济及新的生产因素的成长。中国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大多是为了政治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发展商品的需要，这和西欧中世纪末期的城市经济不同。另外，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汉武帝以前的商品贸易基本上还属于自由的商品经济，国家干预的程度相对要低得多；但汉武帝以后，国家凭借君主专制制度垄断了大宗的商品贸易，如盐、铁等主要生活资料的经营权都具有官营的性质。商业完全被束缚在农耕自然经济的肌体之上，商业对政府的依赖性导致了商人性格的封建依附性。商业在中国传统社会从来没有发展成为与农耕经济分庭抗礼的经济形式，中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的萌芽虽然出现很早，却始终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三、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基本特点及其对文化发展的影响

1. 农耕经济的持续性与中国文化的延续性

农耕经济的持续性造就了中国文化的持续性。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使其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和凝聚力。5000年来，王朝不断更替，战乱时有发生。中国文化也历经战乱与分裂的洗礼，不断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升华。然而，中国文化的早期定型，也使人们产生了一种“瞻后”式的思维方式，所谓“圣人设教，为万世不易之法”，一切以古为尊，动辄发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式的叹息。这种文化思维模式，一方面为中国文化的长期延续和增强向心力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在不知不觉中积累了文化守旧性格，成为社会向前发展的严重桎梏。

2. 农耕经济的多元结构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

在思想上，中国文化在创始之初包容百家学说：道家老子、儒家孔子、墨家墨子，还有主张天人相分的荀况、集法家学说之大成者韩非、唯物论者王充、无神论者范缜，如此种种，都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

在区域上，中国文化包容了不同区域的文化，又促使不同区域的文化相辅相成、渐趋合一。例如，陕西的秦文化、湖北的楚文化、山东的齐鲁文化、河北的燕赵文化等，都被包容在中国文化里。不同的文化又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例如，京剧就是融合了多种戏剧的产物，京剧吸收了传统的南北各地的戏曲形式，如南戏、昆曲、高腔等。

在吸收少数民族文化方面，汉代北方少数民族的器用杂物、乐器歌舞为中原农耕民族所喜爱、效法。盛唐时长安胡骑、胡音极盛一时，清代满族妇女的旗袍在全国各地流行。

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中国的佛教既有儒道文化的成分,又有外来佛教文化的痕迹。特别是明清之际的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显示了中华民族对外来文化的扬弃、吸收。清政府利用耶稣会传教士的技术与知识,让他们在宫廷服务,为朝廷官员画像、治病,但清政府不接受他们的宗教。这些传教士在中国除传播宗教之外,还暗中从事测绘地图、调查中国物产等活动,为西方侵华做准备。但他们也介绍了一些有关历算、水利、机械、火炮、地理、测量、建筑等方面的知识,他们传入的科学技术曾对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由此可见,中国人能够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

3. 农耕经济的早熟与中国文化的凝重性

中国农耕经济的基本特点之一是既早熟又不成熟,农耕经济的这一特点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凝重性。所谓凝重性,就是稳重有余,灵活不足;开放不足,保守有余。回顾上下五千年,汉、唐、宋都曾有过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繁荣时代。元朝在统一全国的同时,就开始恢复海外贸易,但一直处于时禁时开的局面。明代嘉庆年间,沿海屡遭倭寇骚扰,以后葡萄牙海盗商人又在我国东南沿海进行掠夺。明朝政府曾一度封锁全部通商口岸,禁止客商往来。清兵入关后,也实行过“海禁”政策,并三令五申,严禁商民下海贸易。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宣布废除海禁,指定澳门、漳州、宁波、六台山四处为通商口岸。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又规定只准在广州一口通商。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闭关锁国的局面才被打破。由此可见,在农耕经济条件下,中国一直是比较保守的,显然这种局面与传统文化凝重的保守性格是紧密相关的。

总之,中国传统自然经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

第三节 中国文化依赖的传统社会结构

社会组织结构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关系,即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所存在的互动,它是社会秩序统一的体现。社会结构与社会经济(业缘)有着直接的联系,同时也是血缘、地缘等相关要素复杂整合的结果。中国古代是一个等级社会,从先秦迄于明清,尽管社会形态有所变化,但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结构却长期沿袭未变。

一、西周宗法制度的产生与确立

宗法制度就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远近亲疏为标准,标榜尊崇共同的祖先,区分尊卑长幼,规定继承秩序,确定宗族成员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则。宗法制度虽然是在夏朝开始形成,在周朝才正式确立,但它的历史却很久远,它的最初表现就是氏族社会的父权制度。这种制度是世界上每个民族和国家都经历过的。在父系氏族社会里,世系以父系计算,父权家长支配着整个氏族成员。父权家长死后,他的权利和财产按父系继承,于是产生一定的继承秩序。而一代又一代父权家长生前的功业和权威在其死后仍然对后代具有威慑力,子孙们也幻想得到他们亡灵的庇护,于是产生了对男性祖先的崇拜及随之而来的种种祭祀祖先的仪式。

周公确立的宗法制度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 嫡长子继承制

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度的核心。这是一种始于商代末期法定的王位继承方式,即规定了要由嫡妻的长子继承王位。周王室从成立之后推行固定的嫡长子继承制,这在很大程

度上防止了兄弟之间的王位争夺，还是有其进步意义的。

嫡长子继承制的优点在于定名分，即王位早有归属，嫡长子只有一个，只有他有权占据王位，这就杜绝了兄弟之间为争王位而造成的祸乱。嫡长子继承制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嫡长子继承王位是天经地义，他的贤与不贤不在考虑之列。嫡长子继承制也有太多弊端无法克服，太多的矛盾无法解决。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就是为了争夺王位的兄弟相残。历史上这种例子数不胜数。例如，隋炀帝、唐太宗、明成祖等都不是嫡长子，都是通过种种手段，夺取王位。这些嫡长子继承制的反叛者，都证明了嫡长子继承制原本想制止兄弟间为争王位而残杀的初衷并没有实现。

2. 封邦建国制

封邦建国制即分封制，是古代国君分封诸侯、巩固政权的制度，这种制度也是周代创立的。分封制和宗法制互为表里，构成了封建君主制度的坚实基础。宗法制在商代就已经出现，最初只是宗氏家族的组织方法，当家族上升为国家形态时，家族的这种组织形式便外化为国家的政治组织制度，也就是宗法制。其主要针对权力的继承方法而言，分封制是在宗法制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宗法制确立了王位的继承权，没有王位继承权的王室宗亲便被分封到各地去做诸侯，诸侯其实就是王室的陪臣，诸侯在自己的领地内享有和天子一样的分封权力，他们分封自己的家臣做卿大夫，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四级分封制，这种制度在西周时达到了最完备、最成熟的形态，秦、汉以后的君主集权制是宗法制度的变体和延续，但已不同于西周时期的宗法制。

周王室灭商和东征胜利后，为控制广大被征服地区，把王族分封到各地做诸侯，使他们“受民受疆土”，对地方进行分区管理。诸侯在分封国内，享有世袭统治权，对天子承担服从王命、定期朝贡、提供军赋、护卫周室等义务。

诸侯又按照天子的办法分封卿大夫，卿大夫依此办法分封士。士是西周统治阶级中最低的一个阶层，一般要靠自己的技艺和本领为卿大夫服务。这就形成了王封诸侯、诸侯封卿大夫、卿大夫封士的分封制。秦统一全国后，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但以后历代王朝还有不同程度的分封，只是性质不尽相同罢了。同嫡长子继承制一样，分封制也是企图以血缘纽带巩固政权。实际上，分封制往往造成诸侯割据，连年征战不止。东周列国，即是如此。

3. 宗庙祭祀制

宗庙是包括天子在内的各级大宗供奉祖先神位的场所。宗庙祭祀制度是为了维护宗族团结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制度。其核心是强调尊祖敬宗，家族本位。据史书记载，周天子为七庙，诸侯为五庙，大夫为三庙，士为一庙。

宗庙祭祀制度，即祭祀几代祖宗的制度，自周代开始，经过秦汉、曹魏至清代基本上保留了下来。只是有些朝代的宗庙数量有增减。例如，王莽祭九庙；唐开元十年立九室——祭九代祖先。

这种宗庙祭祀制度，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它对维护宗族团结、维护宗法制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宗族观念。今北京故宫东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便是明清的太庙，西侧的中山公园是明清的社稷坛，还有祈年殿、天坛、地



图 1-2 周公像

坛、日坛、月坛，都是明清皇帝祭祖的地方。中国传统的宗庙祭祀制度不仅世代相传，影响到世世代代中国人的宗族意识，而且也影响到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日本人、新加坡人也很讲究祭祖。很多人家现在仍然设堂室祭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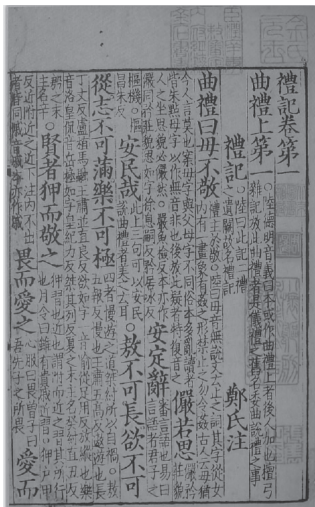


图 1-3 周礼内页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余仁仲本《礼记》

二、宗法制度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不论政权怎样交替，战乱如何频繁；不管是汉人统治全国，还是北方游牧民族统一全国，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宗法制度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各朝各代宗法制度的模式基本上循而未改，世代相传。在相传几千年的宗法制度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1. 家天下的延续

宗法制度的本质就是家族制度政治化。一姓统治一个朝代，只要这个朝代不灭亡，这个家族就一直统治下去。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家族统治中国的历史，一个家族接一个家族，长的二三百，短则十来年的统治构成了中国的政治史。它的特点是：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一个家族统治一个朝代；统治权之争决定着社会秩序的平衡；人情大于国法。

2. 封国制度不断

封国制度是西周宗法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废分封，建立郡县。汉代却又采纳分封制。魏晋以后历代王朝仍然沿用了分封制，只是称谓不同而已。皇帝家族一直享受封邦建国的特权。历代皇帝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自己的家族和亲戚成员分封到某个地区做官。这种制度保证了权利集中在一个血缘家族之中，同时也存在引发叛乱等弊端。

3. 家族制度长盛不衰

家族是中国社会结构中最基本的单位。每个社会成员依据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确定其在宗族中的位置。家族制度的特点：家族是封建社会结构的基石；社会动荡并不影响家族制度的发展；家族拥有各种特权；家族内部等级森严。

4. 家国同构

家国同构指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机构方面具有一致性和共同性。家国同构的特征

如下：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大致相同；家与国的组织系统与权力配置都是严格的家长制；家国同构是宗法制的必然结果。

家族制度深深根植于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之中，使国家结构也打上了家族结构的烙印。家与国的组织系统与权力分配都是严格的父家长制。这种宗法关系的长期存在，导致了中国社会“家国同构”的格局，家族的权力掌握在家长手中，国家的权力掌握在君主手中，国家的政治首领其实就是家长的化身，所谓“忠孝相通”“家国一体”都是建立在宗法制的基础之上的。在国有君、有臣，君为上，臣为下，君为臣纲，后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之说；在家有父、有子，父为上，子为下，父为子纲，后人“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之说，二者在结构上基本一致。孔子的弟子有子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此可谓一语中的，他把对家长的孝和对国家的忠相提并论。孝敬父母就是忠顺皇帝，忠顺皇帝就是效忠国家，忠孝同义。这样，皇帝通过国家行政机构的层层管理，间接实现了一统天下的目的。

三、专制制度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

1. 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特点

君主专制制度指古代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其特点如下。

首先，武力为先导，控制宗教势力，专制时间漫长。中国的君主专制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数千年。它形成于战国，确立于秦汉，延续到清末。它的社会基础是封建宗法制度，它的核心是君主专制集权。它的支柱是庞大的官僚集团和军队，以及宣扬、神化君主和君主至上的宗教势力。在武力的征服下，宗教势力不得不沦为君主专制制度的附庸，宗教的教义必须符合统治者的利益。

其次，经济基础稳定。君主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曾进行过一系列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改革，如商周井田制、曹魏屯田制、西晋占田制、北魏均田制、唐朝租庸调和两税法、明朝一条鞭法、清朝摊丁入亩。这些制度的建立都是为了维护君主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农耕经济。

再次，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走向极端。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的集权制度，经历过不同的形式。

秦始皇设“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和“九卿”辅助皇帝治理国家。魏晋以后，随着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建立，三公九卿的权力逐渐被代替、分割。隋唐三省六部取代了三公九卿的权力，成为实际的行政部門。明代实行内阁制度。清代在中央设置军机大臣。从秦代的三公九卿到清代的军机处，国家的权力机构不断变化，主要是为了实行皇权专制统治，一旦原有的办事机构失去控制，皇帝为了把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就会另外更换机构，并委之以亲信。作为对君主专制的补充，我国古代的办事采取回避制度，就是在办理案件时，涉及的亲属不得参与。总的来看，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弊大于利，权力绝对集中，重人制轻法制，缺乏必要的民主机制。

最后，对人身控制严密。中国古代对平民百姓的人身控制主要是通过严密的户籍制度和颁布有关法令来实现的。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出现，开始有了户口和土地管理制度。西周

金文中在记载人民、臣仆、奴隶数量时,除了以“人”和“夫”为计量单位外,还出现了以“家”为单位的统计法。战国时期各国普遍采用了以 25 家为一社的“书社制度”。秦献公时,建立了“户籍相伍”的制度,商鞅变法时,实行“什伍连坐法”,规定五家为保,十家为连,一家有罪,如不检举,十家连坐。公元 206 年刘邦率军队入咸阳,萧何先收取秦的户籍地图,从而掌握了境内的户口、土地的基本情况。唐代规定居民自报年龄及田地面积,由官府编成簿册,“每岁一造计账,三年一造户籍”。元、明、清时期的户籍制度又进一步得到发展,户口的类别更为复杂,根据居民的职业、民族、宗教、阶级身份及所纳贡赋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的户别,以此来平均徭役负担,作为征发赋役的根据。

历代户籍制度和法令,使居民失去了流动的可能,国家便可以按郡县、乡里、什伍系统来征收税赋、摊派徭役和兵役。帝王的指令很畅通地达到每一个家庭,对每一个人身体的控制就轻而易举地实现了。于是,世世代代的百姓就成了世世代代不离故土的顺民。

2. 传统社会结构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首先,传统社会政治结构的宗法型特征,导致了中国文化的伦理型范式。这种范式所带来的正面意义是使中华民族具有很强的凝聚力,但它的负面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古代社会根深蒂固的人情大于国法的弊端,正是由此而形成的,所谓“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曲中矣”。

其次,社会政治结构的专制型范式,导致了中国文化的政治型范式。这种范式的积极影响是强调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造就了民族心理上的文化认同。它的消极影响是使国人存有严重的服从心态,对权威和权力过分迷信。在严密的人身控制之下,人们只能生活在一定的圈子内,处理好人际关系、家庭关系,成为人们一生中的主要任务。

最后,传统社会政治结构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负面影响。在伦理政治的束缚和限制下,人们一生下来就被固定在一定的名分之内,循规蹈矩是社会对每个人的要求,因而极易养成唯上、唯书、唯亲的人格。君主专制制度缺乏民主机制。因此,“官本位”现象一直是困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严重阻力。“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及“存天理,灭人欲”等封建纲常礼教,严重桎梏了人的个性发展。

宗法与专制的结合,在政治上表现为儒法合流,在文化上的反映则是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突出表现为知识分子“内圣外王”的心态。中国文化的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范式从“内圣外王”的矛盾统一体中获得了坚韧的理论架构,并以小农自然经济和宗法专制社会政治结构作为牢固的基础。这几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形成了一个严密体系,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牢不可破的堡垒,把人们禁锢在了一个狭窄的天地里。因此,在这样的中国政治环境中生活,一方面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加强了,国家利益、君主利益至上的观念被强化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了传统社会中一个人人可行的政治标榜;另一方面,“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及“存天理,灭人欲”等封建枷锁使人的个性解放受到极大的束缚和阻碍。狭隘的小农意识又使得中国人缺乏进取意识,自我满足,这些都是困扰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严重阻力。

【案例】

家族制度的弊端：传统家族制度下中国青年男女婚姻的意义

“吾国古代结婚，是以传宗接代为第一目的，个人只是宗族谱牒的一阶段。个人与谁结婚，不依个人的意思，而以全家幸福为标准。因之，我们要知道钗、黛二人中，谁与宝玉结婚的希望最大，一须比较两人的体格，观谁能生育健康的婴儿；二须比两人的性癖，观能与家人和平共处。”（摘自萨孟武著，《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

此案例说明中国古代家族婚姻意义已经不是婚姻男女当事人个人的事情，而是家族和家庭延续的需要。宝玉与黛玉的纯真爱情在传统家族制度下难以实现，而宝玉与宝钗的婚姻结合却直接折射出了中国家族制度对婚姻的取向。从压制个性角度、重男轻女角度也反映出中国传统家族制度的弊端。

【关键词】

历史地理 地理环境 自然地理环境 人文地理环境 人类社会 影响范围和程度 文化形成 延续的影响 早期文明 黄河流域 中原王朝 有效范围 文化延续性 大熔炉 文化多样性 开放与封闭 农耕自然经济 自给自足 小农经济 重农抑商 农耕民族 游牧民族 多元经济 经济主体 海洋贸易 资本主义 萌芽 迟缓 持续性 延续性 凝重性 西周 血缘宗法制度 嫡长子继承制 分封制 宗庙祭祀制 “宗”与“族” “家”与“国” 宗子法 宗族制 传统社会结构 文化影响



思考与研究

1. 地理环境就是生态环境，应探讨生态环境对文化的影响。
2. 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多样化有何影响？
3. 农耕经济有哪些特点？它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何影响？
4.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有哪些特征？其对中国文化有何影响？